

中美交往实录

席来旺 编著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多极世界与大国政治	(1)
第二章	跨越历史的鸿沟	(16)
第三章	“小球转动了大球”	(29)
第四章	“空军一号”降落北京	(38)
第五章	白宫宣布:接受“邓三条”	(55)
第六章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70)
第七章	从西雅图到雅加达	(83)
第八章	让我们永远记住“三 S”	(97)
第九章	“最好的外交家是人民”	(108)
第十章	炎黄子孙的情结	(121)
第十一章	友谊派对传真情	(131)
第十二章	铺架心魂之桥	(139)
第十三章	《走遍美国》走中国	(148)
第十四章	共筑安全屏障	(168)
第十五章	实实在在,造福于民	(178)
第十六章	“西部牛仔”巧借东风	(195)
第十七章	“汤姆大叔”盛气凌人	(214)
第十八章	二十一世纪梦圆何处	(236)

第一章

多极世界与大国政治

在我们这个地球的东西方，有两个代表世界两大文明发展方向的伟大国度。

北京，天安门，五星红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华盛顿，白宫，星条旗，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

这两个国家隔洋相望。那浩瀚的太平洋，曾经隔断了多少代人的梦想与希望。

今天，这两个国家已握住了双手。那辽阔的太平洋，已成为连接中美人民友谊的纽带。

冷战已经结束，而世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是制造新的对抗，还是扩大理解、共创和平的未来？

中国提出永远不称霸。为了自己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正在努力寻求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美国宣称仍要领导世界。然而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发现，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便难以担承“领导者”的使命。

是的，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两国需要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合作；为了各自民族的发展与未来，中美两国需要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合作。

寻求合作，不搞对抗，这已成为中美两国发展外交关系的主导方针。

因为合作不但对于两国政治，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都至关重要。

1995年2月26日深夜，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们离开外经贸部谈判大楼，急急赶回电视台制作节目。他们刚刚结束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采访。当出租汽车司机听说这场历经20个月、九轮磋商的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坚持要免收记者们的车费。此情此景，谁还会怀疑中国普通百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关注程度？

而在中美两国知识产权谈判陷入僵局、互相发出贸易制裁的威胁时，政论家们早已断言：谈判必会有一个奇妙的结束，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必会烟消云散，因为引发贸易战，双方将没有赢家。

这再一次证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现在，这种合作已扩展到各个领域：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毫无疑问，中美友好交往与合作已不仅是政治家们的愿望，而且也是中美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美之间的全方位交往，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努力，也必将最终形成一股合力，使中美关系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回顾历史，总有许多苦涩。隔膜与对抗曾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调。

在美国立国之初，开国元勋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曾把中国看成是人杰地灵的“文明

仪之邦”。

但也仅此而已。当时贫弱的中国不可能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国策考虑中占有什么地位。

甚至伟大的乔治·华盛顿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人“不管外表如何滑稽可笑，他们终究是白种人”。

当然，华盛顿没有想到，他的宽宏大量没能约束住其后的美国子孙。美国人不但参加了侵华八国联军，而且逼迫大清帝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当中国随着门户的开放一步步强大起来之后，美国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的份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作为盟国进行了充分的合作。

然而，出于对红色共产主义的仇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曾极力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线带着惊疑与恐怖看着这一切，并随后结成了反华联盟。

然而，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对中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962年，他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首脑们大吃一惊：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有人问他为什么承认中国，这位将军说：“因为它如此之大、如此之古老而又如此多的苦难。”160年前，还是法国的拿破仑谈到中国时说过：“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它睡去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就将震惊世界。”

1969年美国总统一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就进行了以法国为

重点的欧洲之行。在陈列法国艺术珍宝的大特丽爱侬宫，戴高乐会见了尼克松。苏联、中国、越南问题，是这两位领导人会谈的主要内容。

他们站在当年路易十四的客厅的大窗户前，欣赏着窗外视野开阔、美丽怡人的皇家花园。戴高乐说：“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尼克松回答：“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在即将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时，尼克松对这个国家当时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总统讲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欧洲之行结束了，尼克松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摊牌：“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听到这些，内阁成员都十分吃惊地看着尼克松，掂量着这番话的份量。

中美两国敌对、仇视、冷战进行 20 多年了，如果中苏战争中，美国站在中国一边，站在那个与美国不共戴天的国家一边，那就确实像基辛格博士断言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尼克松认识到：“要是苏联对中国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

第一章：多极世界与大国政治

治，而且也会打破世界的结构平衡。”

中国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考虑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不仅如此，美国还看到了中国潜在的价值。

1969年12月18日，基辛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八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的25%，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无视八亿人民，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因此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对话。”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就任总统后致国会的第一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持久而稳定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

国际社会不能没有中国，国际事务不能没有中国的参加。这可以说是尼克松总统的英明，但也可以说是中国自身份量的证明。

不是吗？在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有这种共识。

1979年1月，在为中国领导人访美而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卡特总统指出：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大的利益，我们期望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制造良好的气氛；我们期望正常化将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

卡特总统在华盛顿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中指出，中美建交除有利于美国抗衡苏联外，“有了中国这个朋友，还会有个很有意思的潜在的好处，那就是它能悄悄地改变我们本来很难与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信誉

中美交往实录

非常好；我们把同中国的合作看作是促进和平和加深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途径。”

在邓小平访美结束时，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

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对美国的利益极为重要这一思想，早在 70 年代初就已在美国出现；正式表述这种新路线的则是 1979 年 8 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

8 月 27 日，北京大学，蒙代尔兴致勃勃地向中国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强调指出：“美国正在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它这样做不仅出自诚挚的感情，也不仅是出于自然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坚持原则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两者的结合是所有现代国家建立和维持成熟关系的推动力。”

蒙代尔重申，一个强大而巩固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任何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中国的国家，其立场便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

1980 年 8 月，当里根还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在洛杉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美国新政府对华关系的几项原则。他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但也可以看出，他仍然重视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寻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美中合作关系应是全球性的和战略性的。”要“同该地区国家合作和磋商，共同对付威胁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侵略。”

里根作为共和党保守派，一贯反共亲台。尼克松在 1972 年打开中美关系时曾派他访台，安抚台湾。他在竞选中也发表了不少令人担心中美关系会倒退的言论。但是，外交政策取决于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好恶。正是在里根执政期间，中美实质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1982 年 2 月 28 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与美国总统里根就《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而发的互致信件中，两国领导人都强调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两封信件发出之前，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是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而几个月之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分步骤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对此里根总统指出：发展中美之间“牢固而持久的关系”，“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

但是，历史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处于酝酿着巨大变化的前夜，世界多极化趋势真正开始露出端倪。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中美关系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

80 年代一开始，中美两国就对各自的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

中国自 80 年代初开始酝酿调整的新外交政策，到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和同年 12 月中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明确下来。

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

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且要进一步密切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样，中国方面就改变了前一个时期虽未宣布但实质上是联美反苏的政策，与美国拉开了距离，同时开始了中苏副外长级磋商。

中国政府的这次对外战略调整是相当成功的，以此为框架的中国外交政策到今天仍在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实践。尽管冷战后时代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在进行着重新评价与反思，但相对而言，十几年来中国外交却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

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开始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容。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在1983年春也大致成型。

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不再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而是强调“长期、持久和建设性的关系”；不再强调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而是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性作用；使中美关系的基础多样化，注重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现实地看待彼此的分歧；维持美台关系现状。

毕竟，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有了较为清醒而冷静的认识。

于是，中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之上得以进一步改善与发展。

然而，随着80年代后期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中美关系不断受到国际形势所出现的转折性变化的冲击，并最终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为契机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倒退。在随后3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中美两国均曾不同程度地为恢复和发展昔日

的友好合作而作出过努力，但终因某些失控因素的消极影响而收效甚微。

中美关系一度在逆境中徘徊，在矛盾中发展，离不开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制约，离不开新格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次调整。

在 70 年代以来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通过利用中苏对抗，促成中美之间建立一种默契联盟，借以遏制苏联在亚洲及其它地方的侵略和扩张；二是通过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支持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促使中国发生改变。

然而，随着 80 年代后期国际政治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特别是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影响的减弱，美苏冷战格局终结，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方面因素日渐消失而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方面考虑，也因美国借“六四”事件对华实行制裁而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于是，美国内部开始就如何评估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实施何种对华政策方面展开了激烈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威胁消失之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相对下降。因此，美国无须再在人权问题上“迁就”中国，也不要再用“暧昧”手段来回避中美之间在诸多问题上的争议，更不必在中美双边贸易问题上“退缩让步”。

但对布什政府来讲，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的今天，“中国大得无法忽视它”，亚洲的任何问题，“如果没有中国，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又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第六大武器出口国，要解决地区争端和武器扩散，没有中国的参与同样不可能。

因此，“中国对美国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并未减少，而仅仅是发生了转移。”

但是，对布什政府来讲，如何推进对华政策又常常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边关系的变动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人权问题、战略合作、商业利益，三者既有交叉，又在不同时期互有轻重，从而导致中美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及至年轻少壮的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终于显示出来，人们也越来越看清了当今多极世界中中美关系所处的独特地位。

应该毫无疑问地确定这样一个基本的整体判断，那就是：由于安全因素的持久性，以及美国寻求中国在国际安全上的合作，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依然重要。

安全因素曾是中美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它既是两国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原动力，又是多年来两国关系得以维系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冷战结束时，由于美国低估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导致两国分歧日益突出，不信任和潜在敌意增强，因而在具体问题上的冲突与摩擦不断增加。

经过几年来的探索，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在中美原有的战略关系因素变化之后，确保建立新的战略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基本框架仍然存在。

终于，克林顿政府确认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大国关系；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大国，同中国打交道不得不谨慎小心，如何处理两国间的纠纷，不仅影响双边关系，而且关系到美国在亚洲及全球的战略利益；中美如果严重对抗，不仅将影

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起东亚动荡，美国同样将付出代价，而且不利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国际上有共同的利益，美国在实施其全球战略时不得不借助中国的力量。

此外，当今多极世界中的崭新现象，更使中美关系的地位显得突出。

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原苏联因素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依然存在。虽然原有意义上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已经消失，但原苏联地区还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可变因素，美国在推行对俄政策时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同样地，美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也不能不考虑俄国的因素。

美国力图寻求中国与其开展新形势下国际组织内的合作。这一特色的具体表现在于，当联合国的作用不断加强，而美国又越来越倚重联合国来推行其外交战略的今天，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对美国就特别具有吸引力。加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系，美国在实施其全球战略时不得不借助中国的力量。可以说，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指望在联合国内得到中国的合作。

关注亚太，今天已成为世界主要力量纷纷看重的战略性抉择，1993年开始的全球范围的“亚洲攻势”与“亚太热”就是例证之一。亚太战略同样是美国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华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美国在冷战后终于认识到，亚太地区已成为对美国具有最大影响的地区，而中国的规模、实力及在亚太地区所处的中心地位，使中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

正是鉴于这种地缘经济与政治安全的战略考虑，美国从维

护亚太地区稳定和战略平衡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面临亚太地区美、中、日、俄四大力量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竞争局面,加强中美合作,对于美国迎接各种挑战,维护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

两极体制崩溃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美国的盟国已进入以自身利益为依归、自行其是的新时期。尽管西方联盟的框架犹存,但这仅仅是为了有备无患,而不再是现实的必需和统一行动的机制。美国只有更加注意协调同各种主要力量间的关系,才能在国际事务中起牵头作用。这意味着美国将面临着如何有效地推动大国力量之间的平衡。

西方国家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使中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美国来讲,它要利用中国来抗衡西欧、日本的经济挑战和竞争,它更要把中国作为实现大国力量平衡的重要筹码。美国指望中国能够抗衡日本的军事扩张,同时也企图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

美国逐渐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许许多多的国际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的国际行为直接影响着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切身利益。限制武器扩散、防止核扩散、缓和地区冲突、参与解决新出现的跨国问题、制止毒品走私、促进全球环境保护及人道事务等等,都是美国需要寻求中国合作的领域。

还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经济安全”的优先考虑使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

冷战后维系中美关系的“经济纽带”,是以战略安全角度的考虑为重要前提的。

寻求合作伙伴以发展经济,使自己在以增强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全球综合国力竞赛中处于有利地位,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

第一章：多极世界与大国政治

战略安全考虑的首要问题。对美国来讲，它希望对中国“以经促政”，希望在中国开发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已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具有戏剧性的是，美国终于发现，冷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使美国自己受到最大损害。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确实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

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走过了一段心情矛盾、政策摇摆的曲折历程。

美国的“现实派”懂得，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极强，美国要想增强今后在世界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事务中的竞争实力，最现成的出路就是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1994年5月26日，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

这一天的华盛顿白宫，克林顿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决定延长1994至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

克林顿在宣布“脱钩”决定时，再次重申：“我们必须从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更广阔的范围看待与中国的关系”，美国需要把美中关系置于更大、更能产生效果的框架之内。

对美国来说，这个决定决不是可以轻松作出的。且不说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引起的两国关系长达几年的纠葛，即使在“脱钩”决定前不久的5月19日，克林顿还强调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它不仅涉及美中人民的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在人权方面的利益、美国人民和政府为人权所作的努力，而且还牵涉到重大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

期和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的国际安全考虑。”

当1994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本特森访问中国时，他对中方表示：“一个强大的、繁荣的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利的，因为美中两国都是世界大国。”

1991年1月，江泽民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布什时指出：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有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争取共同发展和繁荣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都负有重大责任。江泽民认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1972年，当尼克松首次来到中国时，他对周恩来说：“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

1993年，当中美两国首脑在西雅图举行“世纪会晤”时，不仅美国朝野纷纷发表评论，而且在日本、西欧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中美由1989年以来的对立走向对话，使中美关系朝改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从而为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一股新风。

人们曾把一些重要国际会议期间的两国领导人会晤称为“多边搭台，双边唱戏”。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这两个国家必须是具有相当国际影响的世界性大国。

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1月两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是一种典型的“多边搭台，双边唱戏”。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两次直接会晤，把世界的目光引向西雅图，引向雅加达。

当1979年邓小平即将跨越大洋访问美国时，他对美国时代

第一章：多极世界与大国政治

出版公司的记者指出，两国关系的发展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是全球战略问题。

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邓小平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来强调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他向在场的美国朋友、同时通过卫星转播向世界宣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邓小平的论断已经受了十几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

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作为两个大国，都担负着相应的世界责任与义务，因此，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双边关系。而中美两国只有保持合作，才更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才更能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